

□ | 甘肃省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资助出版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World History

世界史

教学与研究（第一辑）

杨鹏飞 李积顺◎主编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 田 澍

副组长 杨鹏飞

成 员 刘再聪 何玉红 柴 蓉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省级重点学科建设”丛书编纂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 澍	刘再聪	何玉红	李并成	李建国
李晓英	李积顺	杨鹏飞	张德芳	尚季芳
赵文洪	胡小鹏	党庆兰	潘春辉	

目录 Contents

地区史国别史研究

没有完结的论争

- 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东方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 杨鹏飞 003

- 北美科曼奇人及其平原贸易体系 / 王雅红 029

战时后勤保障的奇迹

-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后勤保障体系 / 周璞芬 041

- 论罗斯福时代美国总统职位变革因素 / 房金蓉 050

- 清洁能源的开发与美国经济的发展 / 张彩玲 061

- 论交通体系建设在美国大国成长历程中的作用 / 宋海英 073

- 科威特什叶派问题初探 / 李福泉 084

-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考察 / 闫伟 100

- 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关系的演变 / 张玉霞 119

- 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铁路因素 / 张琼 128

国际关系史研究

- 伊战后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2003—2009年) / 黄民兴 139

-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探析 / 白建才 153

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

- 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变化因素的新解读 / 党庆兰 178

从犹豫到出兵

- 1978—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决策探析 / 李 琼 190
- 再论战时美国战略及核观念的初步形成 / 闫 晶 205
- 美元霸权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趋势 / 雪 梅 燕晓鸣 215
- 越南战争和经济危机与美国霸权地位动摇的关系 / 鲁宸伊 223
- 1944 年上半年美英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分歧 / 李积顺 237

中外文明交往研究

- 文明交往视域下伊朗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历程 / 吕海军 251
- 宗教学领域新兴研究学科
- Western Esotericism/ 何桂全 267
- “贵如胡椒”:香料成为中世纪西欧的奢侈品现象析论 / 田汝英 282
- 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演变历程 / 吴明萍 297

世界史教学研究

- 一级学科背景下地方高校世界史教学改革刍议 / 郭梅花 311
- 世界古代史教学中的兴趣导引问题 / 李家莉 320
- 世界近代史教学刍议 / 高祥峪 329

书 评

- 一部新意盎然的四百年英国近代劳资关系“新”史
- 《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评介 / 柴 彬 339

地区史国别史
研究

没有完结的论争

——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东方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杨鹏飞

世界各地、各国和各民族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西方的社会发展都出现过时先时后的现象。16世纪以后，西欧率先跨进了资本主义门槛，曾经创造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亚非国家的前进步伐却放慢下来，它们不仅都不同程度地落后了，而且遭到了西方的入侵。西方文明的冲击，极大地改变了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殖民主义入侵的主观上的反动性和同生的客观上的反动性与进步性，一直是学界热门而沉重的话题，本文拟就此作一阐述。

东方国家^①与殖民主义发生联系，与其社会的演进历程有关，其独特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其后来的命运。

正当西方国家的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东方国家的国势正江河日下，出现了整体性的衰败现象。东西方相比，反差如此之大。当时，东方国家

【作者简介】杨鹏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指亚洲与北非。在本文中，出于论述的方便，在使用“东方”这一概念时，在非洲这一区域，偶尔会略微超出北非范围。

的最高统治者没有,也不会站在时代的高度理性地审视这一现实,更不会想到他们的封建王朝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进入16世纪以后,正当西欧逐渐取得优势之时,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亚非国家,出现了整体性的衰败现象。东方国家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择要而论。

首先,封建专制政体的延续。

17—18世纪,封建关系仍在东方各国占统治地位,有的国家发展为典型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的国家和地区虽然还处于游牧部落和部落经济阶段,但也普遍地建立了封建宗法制度。

在西亚,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以素丹为首的封建专制政体。素丹是政治和宗教首脑,各地总督是半独立的封建主,伊斯兰教是国教,高级僧侣又是世俗封建主,他们拥有大量的教会土地,控制了所有的司法机关和文化教育,国家社会生活受伊斯兰教法典的约束。奥斯曼帝国所征服的阿拉伯地区,无论是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底黎波里的腹地,还是阿拉伯、伊拉克南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都有奥斯曼封建主或阿拉伯封建主建立的专制统治机构。

在波斯,18世纪末,在德黑兰建立的卡扎尔王朝也是一个封建专制政体。在苏里曼山脉地区,从事畜牧与商队转运贸易的阿富汗部落也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向封建专制政体发展。在南亚,莫卧儿帝国也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国王是最高土地所有者,其直属领地约占全国耕地的1/8,其余的土地以军事采邑的形式分封给封建贵族。受封的贵族把采邑收入的大部分作为贡赋缴纳,并向国家提供骑兵。在印度尼西亚,专制政体也有了发展。在17世纪中期,印尼虽然分裂为大小不一的封建王国,但土地均为苏丹所有,臣属于苏丹的各级封建主征收租税和组织各种义务劳役等。

在东亚,17世纪初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若干藩属的小国和大明帝国本土毗连,传统的承袭,使朱明王朝君主专制进入完备阶段。17世纪中期,取而代之的清帝国,按照旧王朝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封建专制体制,大清皇帝高居于国家之上,军机处、内阁和六部均听命于皇帝,社会

阶层等级森严。在日本，德川家康将军在17世纪初建立了江户幕府即德川幕府，其政权性质是大封建主的军事专政。这个政权，一直存在到19世纪中期。

东方各国继续保持着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封建制，这反映了东方社会制度的落后与保守，这种落后与保守是导致东方衰败的因素之一。

其次，传统的农本经济和封建经济政策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传统的农本经济，二是重农抑商政策。

封建统治体制，代表和维护着封建的生产关系，而封建的生产关系又维护着传统的农本经济。农本型的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封建地主和牧主占有土地、牧场及主要生产资料，封建租佃制以实物地租为普遍的地租形态；贵族和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供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农民生产自己所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难以发展为手工小作坊和手工工场；商人的活动主要是从事商品买卖和高利贷盘剥，他们在农村还袭用封建的剥削手段，并且没有同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结合起来。总的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商品交换在整个经济机制中不起决定作用。

建立在封建租佃关系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即是这种体制，这种体制延续的制度保证就是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即封建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限制农业经营商品性的发展，限制手工工场的扩大和对矿山和盐田的开发，封锁海外贸易，以及制止商人资本的扩充和商业经营的扩大等。

在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各省总督极力维护封建割据局面，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严禁地方之间的经济交流，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者也实行打击商业资本的政策，掠夺商人所得的剩余价值，使商人的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亦即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得不到保证；在日本，德川幕府通令全国禁止种植水稻、棉花和蔬菜以外的经济作物，勒令流入江户等城市的农民回乡生产，严禁手工工场雇佣工人或扩大雇工等。

在中国,明王朝曾一度进行广泛的海上贸易,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是,当西欧的殖民者在靠近中国的海岸建立了海上统治,并占据了明帝国在东南亚的部分藩属地之后,明王朝则又颁布禁海令,抑制海外贸易的发展。满族封建主夺取全国政权后,更是压抑和摧残明代中期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阻止海外贸易的发展,比如禁止沿海建造3~4桅的快速帆船,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单向进行即中国商人在岸上坐等外国货船前来贸易等。

再次,锁国政策延缓了社会发展进程。

传统的封建政策,使一切制度和思维方式因循守旧,而对外交往的减少和隔绝则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闭关自守。

在日本,为了维护封建关系免遭瓦解,削弱和镇压反封建势力,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西方商人和传教士进入日本,刺激了日本商业的发展和各界人士思想的活跃,也加深了大名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矛盾。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德川幕府于1612年颁布禁教令,把西方传教士驱逐出境,对国内的基督教徒进行迫害;1637年,下令禁止日本人出国,禁止制造超过500石的远洋船只。1639年颁布“锁国令”,宣布只与荷兰商人在长崎的出岛一带进行贸易,^①其他的欧洲人均被逐出日本。1640年,葡萄牙派往日本的贸易使团人员均遭杀害。

在中国,17世纪中期,明亡清兴之际,满洲贵族为巩固新建的王朝统治,曾允许中西文化进行交流,但到18世纪初,当清帝国的中央集权日趋巩固时,即开始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拒绝外来文化。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的大炮才轰开清帝国紧闭的大门。

上述所有闭关自守的举措,都是力图与外界实行隔绝的原始办法。那些办法,并没有使各国的封建政权摆脱危机,只是在客观上阻止了那些国家迅速迈上现代化行程。

第四,分裂与战乱影响了社会发展。

^①之所以允许荷兰人在日本进行贸易,是因为荷兰商人曾协同幕府镇压起义。

在世界历史大转折时期，阻碍东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分裂与战乱。

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但它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而只是一个不稳固的军事行政集合体。其境内民族多，宗教也不同，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巴尔干地区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人与亚美尼亚人，以及近东地区的阿拉伯人等都连续展开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土耳其封建主执迷于武力镇压，战乱不已。除镇压境内的起义外，土耳其统治者还组织和发动对外战争，比如 1768—1774 年、1787—1791 年的两次土俄战争。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导致帝国逐渐走向瓦解。

波斯的萨法维德王朝，也是一个部落和部族的混合体，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动荡不已。18 世纪 20 年代，遭到阿富汗、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的不断入侵。从 40 年代开始，陷于分裂，分裂长达半个世纪有余。

印度，莫卧儿帝国只保持外表的行政上的统一，你死我活的王位争夺、接连不断的各部族上层的反帝国战争和农民起义导致了帝国的解体。马克思说：“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①

日本，虽然在 17 世纪建立了幕藩体制，但由于农民与市民经常暴动，战乱不已。据统计，从德川幕府建立到倒幕运动结束，在这 265 年间发生各种起义 1200 多次。越南，从 16 世纪初开始分裂，“南北朝”对立长达一个半世纪。

概括地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东方的封建生产方式相形见绌。到 17、18 世纪，东方国家历经数百年、上千年的封建体制已发展到极端，君权神授观念的束缚和皇权至上统治扼杀了政体生机；传统的农本经济、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举措、落后的

^①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 246 页。

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等使这些国家形成一个封闭的封建文化圈；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恶性发展，战乱不已。这一切，使东方封建国家走向衰败。

由于世界整体性的加强，在走向衰败的同时，东方国家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已不可阻挡，资本主义诸因素渐次出现。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首先，部分国家的农业经营开始出现商品化与专业化。比如，印度的孟加拉专门种植甘蔗，比哈尔专门生产小麦；日本的京都一带以种植棉花为主，伊势、骏河和九州北部则出产茶叶；中国的湖州种植桑树，山东、河北和河南相当一部分农田种植棉花。这些向单一作物发展的倾向，反映出东方农业已开始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其次，为市场而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逐步建立。比如，日本商人以“换棉”和“出机”等方式控制手工业生产者，有的“出机”商还设立直接经营的作坊，他们招雇工人，建立手工工场。18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手工工场遍及棉织、丝织、造纸、酿酒、砂糖、陶瓷、采矿和海产加工等诸多部门。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松江一带也有商人收购棉花，向手工业者换取棉布，然后交给由他们所控制的染坊。有的富商还设立账房，拥有织机。据记载，苏州地区还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和计日受值的纺织手工工场，有的工场主已拥有织机数十台，雇工数十名。在印度，也出现了缫丝手工工场和计件工资制。在越南，出现了造船手工工场。重要的是，上述手工工场主与雇工的关系均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已开始形成。

再次，一些封建化的城市逐渐被改造为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对外贸易的发展迅速。17世纪末，在日本的江户和大阪，出现了众多的富商，那些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他们贷款给将军和大名，控制其财政。当时，农村人口开始流向城市，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和市民队伍的壮大。据统计，大阪的人口迅速增至30多万，江户的人口达近100万。成为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或港口的还有中国的苏州、杭州、广州、汉口、南京，印度的达卡、巴特那，以及越南的河内等。

在对外贸易方面，不仅一般的邻国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远洋贸

易也发展起来。17—18 世纪，印度的棉丝织品远销印尼、菲律宾、非洲东岸、中近东、俄罗斯和西欧；中国的棉布、丝绸、瓷器、铁锅、茶叶和食糖等输往朝鲜、越南、南洋、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地。

最后，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反封建礼教和主张个性解放的作品。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和日本的元禄文化等即属于这类作品。《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从繁荣走向衰败的故事，故事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叙述了上述封建家庭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和矛盾冲突，挖掘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残酷、虚伪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真实地再现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及世风的浇漓，大胆地预示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日本的元禄文化则以城市工商业者的生活趣味为题材，反映了市民追求享受、商人发财致富和市民阶层新的向往，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

东方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对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瓦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东方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发展较缓慢的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地区还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个别地区如南太平洋的某些岛屿还处于原始公社的不同阶段或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发展较早较快的国家所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也远未达到改变封建经济基础的程度，封建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仍占压倒优势，并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

二

亚洲各国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道路，为殖民主义的入侵提供了现实空间，其民族运动是东西方文明冲突重要表现之一，也是东方民族一种本能的自卫性反应。

亚洲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基础之上的，它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实现自给自足，农民不但

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虽然交换也在进行,但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随着产业革命发生和机器大工业的建立,随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到商品经济洪流中来,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剥削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原始积累时期凭借暴力、欺骗和公开劫掠的方法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逐渐被“自由贸易”所取代。

西方国家利用经济上的优势,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极力把东方国家变成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与原始积累时期的直接掠夺相比,“自由贸易”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仍然是一种掠夺。当它们不能以工业品来进行有利的交换时,就偷运鸦片;当它们不能顺利地进行倾销时,便借助暴力,强行索取“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①在一般情况下,所谓“自由贸易”,对东方国家也是以最有利于西方的价格出售商品,以最低价格收购原料,获得最大利润。

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对亚洲进行商品倾销,主要是倾销棉纺织品。这一倾销,经历了一段不光彩的历程。它们对亚洲国家的贸易,是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来进行的。以印度为例,19世纪初,英国提高了从印度输入本国的棉布的关税,却降低了本国输入印度的商品的税率。他们首先把印度的棉织品排挤出欧洲市场,然后向印度输入棉纱,最后则倾销棉织品。就是在这样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强制之下,亚洲广大地区成了西方商品倾销的场所。

对于西方商品的冲击,亚洲各国都进行了抵御,但亚洲国家的自然经济终究无法阻挡这一冲击,印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诸国和中国等国家与地区相继为西方的商品提供了销路。至此,亚洲也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②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亚洲各国人民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那些斗争,既有下层群众起义,也有上层改革。这一斗争

①郑家馨、何芳川:《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②郑家馨、何芳川:《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历程,可分三个时期,即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和19世纪晚期。

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是西方殖民者掠夺东方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可称为原始积累或商业资本时期。此时期的掠夺特点是公开抢掠和直接搜刮,如发动战争、抢劫王宫、勒索战争赔款、征收苛捐杂税,以及实行商品专卖等。这种掠夺,虽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但只触及社会发展,没有触动亚洲社会的基础即自然经济。

西方对亚洲的侵略,引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抗。但是,在19世纪中期以前,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规模较小,只限于一些国家的局部地区,斗争也是孤立进行的,一般说来,没出现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第一阶段的内容主要有1674—1679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杜鲁诺·佐约起义、1685—1706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苏拉巴蒂领导的反荷起义,1637年菲律宾柯拉律领导的反抗西班牙侵略的斗争、1744—1829年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和1767—1789年印度迈索尔苏丹领导的反英起义等。

在这一阶段,民族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反殖民的斗争大都是在各国封建主的领导或直接支持下进行的,如菲律宾的柯拉律,印度尼西亚的杜鲁诺·佐约,印度迈索尔的海达尔·阿里苏丹和铁普苏丹等都是当地的封建主;还有,斗争只具有自发的、分散的和局部的性质,尚未形成亚洲规模的民族斗争高潮。

19世纪初至70年代,是西方掠夺东方的第二时期,这个时期可称为工业资本时期。这时,西方殖民者除保留旧有的剥削方法之外,还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亚洲国家变为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这种剥削方式,给东方国家带来的社会灾难更为严重,因为它开始破坏自然经济这一东方国家的根基。

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已接近完成。对英国来说,不断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为达到目的,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打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及其他东方国家的贸易垄断权,二是打开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门户,扩大商品销售市场。

1813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使英国工厂主和商人获得了直接向印度销售商品之权,这也意味着把印度向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开放。1833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把中国也向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开放。1841年,英国以军事威胁作为手段,强迫伊朗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42年,通过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这样,伊朗和中国便成了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开始走上半殖民地道路。

随着商品销售市场的扩大,英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亚洲国家。大量的商品倾销及原料的掠夺,引起了亚洲各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由于英国工业品的大量倾销,致使印度的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著名的纺织工业中心达卡城也迅速走向衰落。据统计,1827—1837年,达卡城的人口从15万减到20000人。除达卡城以外,印度的其他手工业城市也相继走上萧条之路。

在大量倾销工业品的同时,英国还在印度推行了固定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和不固定柴明达尔制等一系列土地税制度。新土地税制实行以后,英国殖民者的土地税收激增,但这些从印度农民那里掠夺的财富很少用于农业生产,造成印度农业普遍衰落。中国、伊朗同印度的情况虽有区别,但西方侵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基本相同,即当地的手工业和农业普遍衰落。

在倾销商品的同时,西方国家把其文化和思想也传入了东方,使东方国家的传统观念包括服饰、饮食、发型、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等均受到极大冲击。面对冲击,东方各国反应不一,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等在一些国家交替进行。中国、波斯、印度、缅甸、阿富汗、土耳其和印尼等先后发生了群众运动,奥斯曼、波斯、越南、朝鲜和中国等进行了仿效西方的改革,日本则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这里所说的民族运动,包括下层民众起义和封建上层的改革。19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运动的主要内容有1825—1830年蒂博尼哥罗领导的爪哇人民反荷起义、1848—1852年波斯巴布教徒起义、1851—1864年中国太平天国革命、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1838—1842年阿富汗军民的

反英斗争、中国军民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斗争、1857—1859年波斯的反英战争，还有雷希德领导的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1848—1851年伊朗的密尔扎·塔吉汗改革、奥斯曼帝国的谢里姆三世的改革和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19世纪20年代越南嘉隆王朝的改革、19世纪60—70年代朝鲜大院君的改革、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泰国朱拉隆功的改革以及缅甸曼同国王的改革等。

先看起义。这一时期，各国的起义都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点。

首先，斗争几乎是同时发生，在打击外国侵略者方面，客观上是一致的。印度的反英起义，打乱了英国的侵略部署，迫使英国把派赴波斯和中国的侵略军于中途调回印度，从而间接地支持了波斯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英国侵略缅甸和阿富汗的计划也不得不因此拖延。

其次，斗争的基本动力是下层民众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领导这些斗争的主要是地主阶级的抵抗派和改革派。中国的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和陈化成，印度的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以及雷希德和密尔扎·塔吉汗等就是代表。

第三，从指导思想和口号上看，起义都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起义者普遍打着宗教旗帜开展斗争。打着宗教旗帜开展斗争，这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从历史上看，打着宗教旗帜号召民众起来斗争，这是各国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现象。在先进思想产生之前，宗教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它是一种斗争手段。

关于斗争口号，在起义过程中，起义的领导者都提出了理想和奋斗目标。爱国的封建王公提出“恢复独立”的口号，农民起义军领袖提出建立“正义王国”和“理想社会”等口号，有的起义军还有比较完整的纲领，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认识不到社会发展方向，纲领也无法落实。封建王公提出的“恢复独立”，实际是恢复封建王朝；农民领袖提出的理想，实际是平均主义，不可能实现。有的虽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在实际上会蜕变为封建王朝。

总的来说，19世纪中期亚洲各国的下层民众起义，是低水平的起义，是一种中世纪的旧式运动，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后来，起义均告失